

沈从



笔下的

中国社会与文化

[美]金介甫 著
虞建华 邵华强 译

SHEN CONG WEN
BI XIA DE
ZHONG GUO SHE HUI
YU WEN HUA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沈从文笔下 的 中国社会与文化

[美]金介甫 著
虞建华 邵华强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沪)新登字第201号

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

[美]金介甫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125 插页: 2 字数: 250千字

1994年7月第一版 1994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本

ISBN 7-5617-1149-2/I·093

定价: 12.00元

中译本序

程应镠

金介甫先生著的《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由虞建华、邵华强同志译成中文，我是很高兴的。

开始读从文先生的书，我已进入高中了。当时，我非常喜欢郁达夫的作品，但《边城》把我带到另一个使人迷恋的世界。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从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变成在高等学校讲授历史的教授。去年秋天，我看了《边城》的电影，还有着和往日一样的淡淡的哀愁。

从文先生的书，三十年来，不为人所重，我是觉得很奇怪的。人们可以作这样的说明，也可以作那样的说明，但都无补于这个已经成为事实的损失。我深深地知道，凡是读过《边城》的人，对靠近湘西边境的碧水青山，对那住在塔下的老人和风日里长大的翠翠，没有一个不心驰神往的。

沈先生的为人也和他的书一样，五十年来，一直为人所倾慕，所敬重。“一二·九”运动中，燕京大学有个文艺社，出版了一种以“青年作家”命名的文学期刊。这个期刊的发刊词《对于一个新刊诞生的颂词》，就是沈先生的手笔。文艺社成员都是爱好文艺、要求抗日的青年，以为文艺是打击敌人的武器，其中还有不少是加入

“左联”的。

抗日战争之后，昆明成为后方一个文化中心。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陈铨著文提倡“英雄崇拜”。在《读〈英雄崇拜〉》一文中，沈先生以为到了二十世纪，神的解体是十分自然的，再也不需要什么宗教情绪了。他反对迷信，坚持五四运动提倡的民主与科学，以为不宜提倡什么英雄崇拜。这篇文章大约是1940年写的，距今已四十五年了。

中断了文学创作之后，从文先生致力于古代文物的研究。汪曾祺同志在祝沈先生八十寿辰的诗中说：“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在为抒情。”从文先生在历代丝绸、瓷器、玉器、漆器的研究中，倾注的是对祖国的热忱，是对祖国文化的无限深情，和“玩物丧志”是不相干的。

1956年，他为上海师范大学（当时称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在北京收购古代铜器、瓷器、玉器、兵器和大量的碑帖，其中有很多精品。他以为学习历史、研究历史，要把文献知识和地下发掘的实物相结合。他还把自己收藏的丝绸、拓本和纸张送给师大，有极不易得的东魏高贞碑和乾隆的织锦。1963年，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吴晗主编的《中国历代史话》中《南北朝史话》的写作。这部史话的插图全部是从文先生选制的，其中《北齐校书目》和《南朝农民》都是摹本。在这些插图上面沈先生所费的心力，每一回看到，每一回都使我回想起青年时代寄文章给他，经他修改发表以后我的感激之情。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部呕心沥血之作，和他盛年所创作的《边城》、《湘行散记》……一样，都倾注着他对我们这个民族和民族文化的深情与厚爱。金介甫先生的著作，对于了解从文先生的为人、为学和他的作品是有帮助的。作者是美国人。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作家，也有助于我们的反思。

1986年1月13日

代 序

钟开莱

金介甫这本书是研究沈从文著作的。我不懂这种研究，只是一个老读者。这个“老”字不一定指年龄，而是按“老主顾”、“老朋友”的用法。说来话长，开始是个小读者，在杭州读中学时，在父亲的黄木书橱里发现几本沈从文的集子，夏天在楼下躺在地席上读小说，想不到十年后在昆明居然认识了这位作家。当时他住在文林街二十号的小楼上，和我同王逊合住的昆中北院只隔一个操场，中间有一株大树（那树 1983 年还看到，稍形憔悴了）。后来同王和两位女人去呈贡沈家作客，受到主妇的殷勤接待，住过一次或两次。沈先生工作紧张，我们虽属比邻，经常不多闲暇。到了他家里才有机会听他的高谈。读过他的《八骏图》、《春》那些故事的青年人，或许把他看作某种微妙关系的专家，引起好奇的兴趣。记得他有一次正经地说：黄眼睛的女人性格不好办。可不知有哪篇象征故事作证？大战结束后我和中国隔离长远，1972 年回去竟找不到他们。直到 1975 年夏天一个下午，沈夫妇到北京新侨饭店来访，匆匆已三十年。记得那天他身穿端正青灰色制服，红光满面，谈话中笑呵呵的，好象一切还是那么“照例”、“照旧”。这次重逢之前，在杭州曾接到他的一封长信，八、九张信纸，草字连篇，几难尽

识。告诉我早已改业作历史考古工作，铜漆衣冠样样都搞，做得十分上劲！后来还送给我们一些零星剩余的服装材料，一块袖口，一条裙边，现在都挂在我家门旁墙上了。光阴荏苒，1979年到京的次日，承某院派车送到沈先生所住很不好找的小羊胡同。幸喜他们两位都在，进了房间，大概就是后来黄永玉^①描写入画的书房兼卧室兼客厅了。房虽小而阶前院中那一丛紫色的花（牡丹？），开得何其茂盛。再不到两年，他们访美期间，在这里教职员俱乐部住了几天。每天早晨到我家吃稀饭（沈先生爱甜点心、桔子水），晚上喝鸡汤燉白萝卜。他在校^②的公开演讲中，提到中国近年动乱中的经历，以“不在乎”三字说明了他有所不为的立场。那时，尚忆他在1975年间曾自夸能一马当先爬到黄山峰顶，故想同去附近小山上转一转。可惜时过境迁，只由我的小孩开车到“天线道”上，望了一回加州冬景。1981年匆匆路过北京去访，沈先生还亲自站在街心等我们（因为雇车驾驶员不悉路径，虽然实际上就在新侨旁边），手中拿着一张纸在读呢。沈太太则正上街去买洋面包。1983年我从武汉坐两夜火车去昆明途中，经过怀化和芷江之间，看地图知道可以翻一段小路去沈先生的老家凤凰。到昆明后很高兴的给他们去了一封信。后来才知道他有病。可慰的是1985年春天去访时，沈先生仍然嘻嘻地听我们说笑话，康复多了。

沈先生夫妇在这里期间，我把家藏的五六本薄纸小字的坊本旧版，拿出来请他鉴定。他的记性真好，不但把每本书出版的原委说明，还指出一本偷印的将《黑风》改为《黑凤》的集子。现在他的十二本金面精装的文集，都已问世^③，还有那本掀不动的重大服装

① 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附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沈从文散文选》中。

② 即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本书译者注。

③ 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以下所引均指此集。

史！若是做研究的，应该把这些书翻翻温温，寻章问句，引经据典地找出一些可供参考的动人内容和奇异笔法。却怪过去模糊记得的字里行间，查出来只觉得似曾相识（可能有些被“存目”存掉了）。而当前在目的篇章，倒有些令人纳罕的地方。譬如亭子间里的那个寂寞女孩子，原来是“玲玲”不是“三三”。她衣袋里那四个大铜板，可照旧在那里叮呤啷当地响着^①。“凡是门，有不开的吗？”这句响亮话可躲在一篇题名《第四》^②的故事里。金介甫告诉我他搜集的沈从文档案有七、八百件之多，恐怕要做个索引也不容易吧？

当然，以沈从文笔下的中国而言：湘西，凤凰，苗族，杀人，当一个小兵，看一本“大书”，吊脚楼上，桔子园中，这些就尽够研究的了。有《从文自传》，《湘行散记》这两部读不尽的好书，资料是丰富的。可惜自传只到二十岁为止，其后呢：窄而霉的会馆那一段，青岛看海划砂那一段，其间还有坐三十点钟火车去苏州的那一段插曲，写成《躁》^③的故事，半世纪后还须让小姨子的妙笔来给好奇的读者作一个美满的补充^④（1981年10月，我们承沈太太的关照，还到那个九如巷张家老房子里去盛筵。照例必须主妇和媳妇作十几样新鲜菜饗客，有真虾仁和菱角！）……还有上海弄堂里亭子间那一段，昆明乡下逃警报那一段，回去北京改业下乡那一段，这些都是沈从文的中国。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十几本已印的，和不知多少本未印的书中表现出来。有人说一个作家无论写得上下天地，五花八门，归根到底总是在那里写他的自传！人生苦短，不能在同一河流中沐两次浴。我们的回忆中，往事和旧梦相混。一个国家的历史上，一个作家的生活中，事实和想象真能分得清楚

① 见《白日》，《沈从文文集》第五卷。

② 见《沈从文文集》第四卷。

③ 见《沈从文文集》第八卷。

④ 张充和《三姐夫沈二哥》，载《海内外》第28期，1980年。

吗？沈从文的笔下，都是中国一代的外史。

沈先生当然是文体家。言之无文，其行不远。在他近年的演讲和序言中，他一再自述如何学习写作，如何要“掌握那一支笔”。他的用字造句有特殊的风格，连故事里一些角色的名字都那么清新有趣：如蕤、若墨、龙朱，……。若干字眼经常用着，读到如见故人：“照例”这样，“照旧”那样，又“仍然”、“俨然”怎么样；“白脸长身”，“无望无助”，“小小得失”，“荒唐”，“撒野”……有些句子是错综倒装的，读来反觉自然而有劲，据说曾被批评为不合文法。似乎沈先生在某处说过：一个好句子掷向地下都会铿锵作声！可惜找不出这个记忆的来源。他那娓娓的、时或亢亢的语气笔调，抑扬顿挫，需要用耳朵去领会的。用这样的文体表达中国民族的方言和语音，不是可以作为专题来研究的吗？可是正因为沈先生的文笔是有个别声音的，这种声音是不易翻译的，向外国介绍他的作品有一重困难。即使欧美各国同根的文字，互相翻译富于体裁的文学亦难以传神，何况中西悬隔之别？（日本文一定好办些^①。）世间好学之士，颇多以读一个外国作家为动机而去学他的语文的。金介甫先生这本书，在中国是可作借鉴的。

1986年2月24日在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
抄改几天,雨中所写。

① 可惜我不能读沈从文著作的日本译文，但总觉得他的有些故事和二、三十年代日本作品有近同的音调，例如夏目漱石的《独头教师》（原题《哥儿》，章克标译，载于1930年7月《小说月报》中），惜无机会请问沈先生有无影响共鸣？曾见此篇的英译，虽还可读，总觉得不过瘾，可能是语音不同之故。

鸣 谢

我衷心地感谢这项研究的指导者许华茨教授 (Benjamin I. Schwartz), 他给了我一系列的启发、指点和许多有价值的批评。我也由衷地感谢费正清教授 (John King Fairbank) 在这项研究中所提供的卓越的指导和热情的鼓励, 以及在此之前对如何研究中国历史诸问题的点拨。同时, 我也感谢亚历山大·伍德赛教授 (Alexander Woodside), 他首先在哈佛大学“从文学中研究社会历史”的研讨会上提出沈从文的著作具有社会史料的研究价值。伍德赛教授、埃兹拉·沃格尔教授 (Ezra Vogel), 派屈克·韩南 (Patrick Hanan), 许华茨教授和余英时教授 (Yu Ying-Shih) 都参加了这项研讨, 并且在此之后提供了许多帮助。劳埃尔·M·霍夫海因茨教授 (Roy M. Hofheinz)、约翰·C·帕兹尔教授和大卫·迪尔 (David Deal) 也都奉献了他们各自严谨的观点。我感谢季博思教授 (Donald A. Gibbs) 和夫人李芸贞 (Yun-chen Li Gibbs) 对这项研究的支持。杜博妮教授 (Bonnie S. McDougall) 与我多次讨论过中国文学, 在读完本书初稿后, 她又不厌其烦地指出我的立论、知识结构乃至行文上的缺陷, 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沃格尔教授和梅尔·哥德曼教授 (Merle Goldman) 热情地邀请我参加1974年在马萨诸塞州丹德海姆召开的“现代中国社会中的作家角色”研讨会。这次研讨会, 激发了我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趣。

伊利诺斯大学的苏绍礼教授, 台北的杨致、陆国新和陆惠风等,

在这项研究的各个阶段为我提供了语言上诸多方面的帮助。在其它方面提供各种帮助的还有：卞赵如兰教授(Rulan Chao Pian)，伊利诺斯大学的恩斯特·沃尔夫教授(Ernst Wolff)，威廉·L·麦克唐纳(William L. Macdonald)教授，瑞斯大学的瑶族人种研究专家理查德·卡斯曼教授(Richard Cushman)帮助我解释了许多令人困惑不解的中国西南文化史问题。林培瑞教授(Perry Link)和冯惟翰博士(Richard Forde)也提供了许多帮助。

陈纪滢先生、孙陵先生，傅汉斯教授及夫人张充和先生，在与我的会谈中提供了许多关于沈从文生平的重要资料。受难会约翰·波尔神父(Rev. John F. Poole)和克莱蒙·布克利神父(Rev. Clement Buckley)特别恩惠地允许我查阅新泽西州联合城受难会的档案。这些罗马天主教会传教活动的材料对沈从文的家乡有着忠实的记录。受难会的罗格·麦卡拉神父(Rev. Roger Mercurio)，考麦克·夏那汗神父(Rev. Comac Shanahan)，及已故的希尔法恩·麦格埃尔神父(Rev. Theophane Maguire)，和受难会的罗伯特·卡邦奴神父(Rev. Robert Carbonneau)也同样对本人的研究给予了广泛的帮助并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学地理系的南顿·金斯伯格教授(Norton Ginsburg)和其他老师，他们是我最初学习的老师。他们昔日的栽培，使我能较敏锐地解决一些在历史研究中产生的地理问题。

本项目在美国教育部的帮助下，在济尔斯·怀丁基金会及时而大量的奖学金的资助下得以完成。没有这些经济上的帮助，要完成这项研究是无法想象的。

本书仍存在不少错误缺陷，皆由本人负责，与上述任何人无关。

金介甫 (Jeffrey C. Kinkley)于美国新泽西

中译本作者自序

我衷心感谢译者——中国朋友和同行学者，他们认真严谨的译本是十分出色的。我和内子康楚楚也为能在出版之前审读译文而感到特别荣幸。

鉴于种种原因，在中国朋友的建议下，奉献给读者的《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中译本压缩了有关湘西地理历史背景概论及沈氏早年生活传记的第一至四章。其余的仅有几处技术性的修改，其内容同 1977 年英文原版基本一致。1977 年以后，我有幸访问了中国，拜晤了沈从文并漫游了他神奇的故乡湘西。同时，我也得以有机会同中国沈从文研究学者广泛作了交流。所有这些都拓展了我的研究领域，使我对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在艺术上的成就和思想及文化史上的贡献有了更新更高层次的理解。为此我感到写第二本研究沈从文的书，似乎比修改此书更为合适。这本新著作为沈从文的生平和他作品中人物的概貌介绍，要更加全面详实仍是比较困难的，为此或许需要花费数年时间。但从现在起，我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提供一个概貌的介绍，而是要探究蕴含在沈从文作品深层结构中的真正宝藏。当然，这需要更多的学者长时期的研究，也需要更多的著作问世。鉴于此，我感谢沈从文为我们提供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饱经沧桑，但却已被历史证实是深邃的内容和完美艺术形式和谐统一的楷模。沈从文的成就已经经受了狂风暴雨般的国内动乱和国外质难的考验。同样意味深长的是，

他的成就也战胜了恐怕称之为“现代环境”的另一种风平浪静式的挑战,那就是历史上的冷漠和艺术上的平庸。

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

1985 年 10 月于美国新泽西州爱迪森市

引 言

在西方,沈从文和鲁迅、茅盾、老舍一样,被认为是名列前茅的中国现代伟大作家。学者们往往把沈从文同鲁迅相提并论。一般认为,在那个历史时期,不管是在卓越的艺术才华上,还是在把握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生活本质的能力上,沈从文都接近了鲁迅的水准。虽然当鲁迅已经投身于社会革命的时候,沈从文依然主张中国回复到自发的乡村社会中去。他的这个社会理想同鲁迅的理想一样,是抽象而不切实际的。

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说,这两位作家在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发展中都各自开辟了新的领域,树起了新的标尺。鲁迅或许以《狂人日记》这篇小说单枪匹马地创造了新型小说。他以自己的精心之作对文学创作作出了贡献;他的作品大部分是在十年之内完成的。而沈从文则以其多产的作品吸引了广大读者,并一直以不拘一格的语言和文学上的尝试激励着年轻的中国。这些尝试承担了清除新文学的无形禁锢的使命。一些读者喜欢沈从文别具风味的作品;另一些企图寻找更熟悉的文学题材的读者,则决意从此不再读他的作品。毋庸置疑,沈从文比鲁迅晚了好几年才达到鲁迅的艺术水准。鲁迅这位前辈作家不仅接受过中国古典文学训练,而且学过西方的文学技巧。在他最早期的著作中,他以堪称最佳文言文学的细腻洗练的笔触表达了人的感情和性格动机。而沈从文则差不多完全靠粗糙的自学。他早期作品是散乱的,有时

也是色彩斑斓的。1924年，当他最初的一些作品出版时，他的进展并不明显。但到了三十年代，他的小说以其优美笔调和富有感召力的语言而受人称誉，这使人惊叹不已。

虽然这两位作家都创作了无须批评家捧场便可证明其自身价值的优秀作品，但他们仍和许多同人、读者一样，认为“严肃”文学的价值应由它对现实生活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来判定。鲁迅在理论上是革命者，实践上至少是社会批评家；沈从文也在社会批判方面一试身手，但支配这位年轻小说家的创作的，似乎是为梁启超那一代人所熟知的老式的概念。他通过小说中表达的理想，试图直接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和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关系。沈从文的作品有时还表现出一种乐观主义，他的观点对当时其他知识分子似乎是陌生的。

在沈从文和鲁迅的作品中，人们都可以发现一种产生于作家社会意识的感召力。一九一七年的白话文运动和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各种外国思潮涌入中国。在这股潮流中，沈从文和鲁迅可看作是从中国人角度看待中国的作家。他们本人都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鲁迅较为深刻，沈从文则较为朴素），但他们的早年生活，使得他们都没有产生过在文化上失去根基的感觉；在后期作为作家的生涯中，各自施展了以细致描绘古老的风土人情来唤醒中国农村的才能，而且，他们也始终保持着对这个古老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和默契的感情的敏感。鲁迅背叛了他幼时的周围世界，但又不能丢开这个世界不管，任它自生自灭。而且他也不象那些乐观的革命者一样，作好了准备，迎接一种新秩序的到来，希望这种新秩序强大得占据全部世界，把旧社会窒息。沈从文更是如此，他也反对许多儒家规范，但对新的和旧的秩序不承担义务，他只是歌颂了一种来自中国的一个角落、来自受儒家影响最少的社会阶层的传统。他从未涉足异国，也没有学过外语，二十多岁以前连中国

沿海城市也未瞥见。所以，他的社会观即使充满异乡情调，仍必然是朴素的。

在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之后，也就是革命文学时代，鲁迅被尊为革命作家的楷模。而沈从文，在人民共和国是不合时宜的人，在台湾又遭到禁止，相比之下显得默默无闻。他那既非革命亦非完全保守的独立的政治观点和社会立场，使那些在意识形态上自有看法的同代作家们感到困惑。直至四十年代，批评家在论战中还无法将他排档归类。他不能被称为外国利益的代言人。尽管出身地主家庭，生活却比大多数五四作家贫困。他在对普通人民富有同情心的描写中表现出的传神和真实，却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革命作家所难以企及的。

促使写作本书的是沈从文对中国社会状况的敏锐感受，而不是他对中国新文学的成熟的贡献，也不是他作品的文学价值。本书是通过文学而进行的地方史研究；其中的见解主要来自沈从文的作品，而这些作品所具有的如我们所分析的那种力量，又主要来自沈从文本人在连年兵火和社会变迁中的亲身经历，实际上也就是他对中国农村一个地区的人类学现象的深刻体会。此书也得益于他对那个地区（湘西）的经久不衰的毕生兴趣；得益于他没有受社会分析模式的先入之见的约束；得益于他没有在描绘所看到的现象时的民族主义自我意识。这点同鲁迅对照一下是有益的。鲁迅那篇对他的医学学生时代的有名介绍中讲了他看到日本士兵处决中国人的幻灯片时所受到的震动，围观这个场面的那些中国人显得麻木不仁，这给鲁迅以巨大的冲击，以至于促使他当时决心从事文学事业。沈从文从未看到过在帝国主义者命令下进行的杀人——他的反应与鲁迅的不同或许正在于此——但是杀人场面本身，以及对滥杀无辜的集体参预，对他以后来说就具有特殊的含义，并带有一种戏剧性的意味。我们能否这样说，沈从文是用中国

人的声音来说话的，把这看得比西方影响更重要，而鲁迅的声音则来自一种外国冲击下产生的异己观点和自我意识。

当然，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意识到了沈从文的观点和历史事实之间的区别。我们也了解到关于这一混乱时期的中国历史存在着非同寻常的争论，而无令人满意的定论。因此，我们尽可能引用各种史料相互对照参考。在搜集沈从文的历史社会观点材料时，我们很自然地着重于他那些与现实关系更直接的作品，而不是那些分歧意见较多、含义比较模糊、易被曲解的作品。这样选择材料，难免要略去那些代表沈从文艺术顶峰的和表达世界最普遍的人道主义倾向的作品。我们很少提到沈从文作品的文学价值，这或许也会使研究中国文学的朋友感到扫兴。我们也想涉及他的写作目的，他的人生观中的一般美学价值。现在这项研究中传记、风俗习惯，甚至文学语言方面的材料，应该是进一步评价沈从文小说的必要背景。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文学批评，甚至也不是对沈从文文学作品的考察；我们也特地略去了他成熟的后期（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创作中那些与湘西及与中国农村没有直接关系的作品。可以说，我们在这里研究的只是他的非小说作品，以及小说中那些对社会历史研究最有价值的成分。

把沈从文的小说和其它作品当作社会历史的附录来读，可得到双重的报偿。它使社会生活缠夹在一起的各种素质显得明白，而文学本身常常具有揭示社会生活的独特力量，同时它也提供了一些别处难以得到的严酷史实。沈从文的观察力受到他的知识和经历的限制。他常常出现在自己作品的中心，活动在一个地区的相当一段时期的历史中。他在作品中作为一位代表性人物——一名士兵、探索者、出身破落家庭的低层人物，而为我们所熟知。行伍生涯、地方习俗、苗寨生活、乡间幽默和民间传说都进入了他的作品视野。沈从文的特长是描绘而不是作社会学的剖析，但他的作